

M. M. БАХТИН

巴赫金全集

第一卷

论行为哲学

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

话语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

弗洛伊德主义 批判纲要

河北教育出版社

М. М. БАХТИН

巴赫金全集

第一卷

晓 河 贾泽林 张 杰 樊锦鑫 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赫金全集. 第1卷 / (苏)巴赫金著; 钱中文译.—2版.—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434-3128-7

I. 巴… II. ①巴…②钱… III. 巴赫金(1895~1975) - 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7804号

书 名 巴赫金全集(全七卷)

主 编 钱中文

责任编辑 王鸿雁 何春雅

装帧设计 张慈中 于 越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28

版 次 2009年9月第2版

印 次 2009年9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3128-7

定 价 48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理论是可以常青的

——论巴赫金的意义

钱中文

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家中，前苏联的巴赫金的命运是非常独特的。1928年末，他因在友人圈子里做过有关康德等人哲学思想、宗教的报告而被捕。而在1929年，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出版，卢那察尔斯基还就此书写了评论。同年，巴赫金未经起诉、审判，就被判刑5年，经人营救，未往死亡地带发配，而被流放于北哈萨克斯坦的边区小城库斯坦奈。可1930年出版的《托尔斯泰艺术作品全集》第11、13卷，大约由于来不及“清除”其影响，还收有他写的关于托尔斯泰的戏剧作品和分析《复活》的长篇序言。其后自然命途多舛，销声匿迹于文坛，有三十余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65岁高龄的巴赫金“时来运转”，竟被人发现了。于是旧作修订再版，多年被束之高阁的文稿出版问世，其“对话”思想、“狂欢化”理论立刻活跃了苏联文艺界，并不断引发争议；介绍到西方后，却是引起了阵阵轰动。以后，随着大部分写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哲学、语言学、美学著作不断出版，巴赫金声誉日隆，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来，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历久不衰。表现为世界各国的思想界都在探讨他的学说，而

且，二十世纪似乎还没有哪一位思想家享有像巴赫金那样的荣誉，每两年一次召开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并有两本杂志专门讨论其学说，一为英国出版的以巴赫金提出的对话思想命名的杂志《对话》，另一为白俄罗斯出版的探讨巴赫金思想的杂志《对话·狂欢·时空体》。巴赫金将与二十世纪其他伟大思想家比肩而立，他在哲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诗学、历史化学等方面卓有建树，并将在这些领域发挥着持续的影响。据1983年美国学者提供的资料，六十年代下半期至1982年，各国学者就巴赫金思想撰写的著述约有120种之多^①。如今又已过了15年，有关巴赫金的专著、论文恐怕已难以统计了。

巴赫金的被三次“发现”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1895年11月17日（新历）出生于奥勒尔的一个走向破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家银行的高级雇员。巴赫金幼时生活尚称优裕，但患有致命的骨髓炎。后来他在奥勒尔的维尔诺中学念书，7、8年级时随父亲去教德萨，并在那里的教德萨中学就读，随后进了诺沃罗西斯克大学。巴赫金自幼在家学习法语、德语，他平常用德语思考，德语几乎成了他的第一语言，在中学又学习了拉丁语、古拉丁语，后又掌握了丹麦语、意大利语等。

巴赫金自小聪慧过人。他迷恋文学、哲学，酷爱现代诗歌、象征派诗歌，以及普希金、波德莱尔、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

^① 据美国学者D. 方格利于1983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美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上提供的材料。

的诗歌。对诗歌甚至散文过目成诵。少时就阅读德文原版哲学著作，12岁至13岁时就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据巴赫金自己说，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首领赫尔曼·柯亨的著作《康德的经验理论》，对他“影响巨大”，并且他是俄国最早接触丹麦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人。1915年转到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读书。1918年大学未正式毕业，便离开了彼得堡，南去涅维尔小城，在该市中学教书，并在那里度过了饥荒的年头。1919年9月，在当地出版的《艺术节》上发表短文《艺术与责任》。1920年去了维捷布斯克市，在该市的师范学院任教，讲授文学课程，并在维捷布斯克音乐学院讲授音乐史和音乐美学。革命后的维捷布斯克，未受战争影响，所以当彼得堡发生饥荒时，这里供应仍很充裕，于是便在这里汇集了彼得堡来的许多文化界的名流，创办了音乐学院、艺术学院、交响乐队等；一时维捷布斯克文化事业大为发展，在这里巴赫金一直待到1924年5月。他在1921年给挚友M.卡甘的信中说：“这时期我主要地从事话语创作美学”^①。这时，巴赫金写了《话语创作美学方法论问题》《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论行为哲学》等。1924年5月后，巴赫金来到了首都，其时彼得堡已更名为列宁格勒，他一直待到1929年。在这期间，他的好友纷纷云聚周围，其中有文学知识极为广博的篷皮扬斯基，有音乐家、音乐理论家沃洛希诺夫，文学理论家梅德维杰夫，钢琴演奏家尤金娜，生物学家卡纳耶夫等。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听巴赫金开设的哲学、美学、文学讲座。巴赫金后来回忆说，在他周围有个圈子，人称“巴赫金小组”，但这并非真正的“组织”。在这个圈子里，他讲过康德哲学，他认为这是哲

^① 见巴赫金：《话语创作美学》，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页。

学中的中心问题，同时也涉及新康德主义者柯亨、李凯尔特、卡西尔等人；作过关于托尔斯泰、索洛古勃、勃洛克等人作品的报告。这些哲学、文学讲座，篷皮扬斯基和米尔金娜（当时的学生）都做有记录^①。后来巴赫金说，由于“不合法地讲授这种唯心主义课程”，于1928年12月被捕了。据他讲，被捕后待遇尚可，侦讯人员容许他外出治病，嘱他可继续写作。但于1929年年底不经审讯，就被判刑5年，初判流放北方最严酷的劳改营，后经原高尔基夫人彼什柯娃等人的营救，改判发配库斯坦奈。库斯坦奈气候干热，风沙时起，在这里巴赫金“选择了区消费合作社，当经济师”，写财务报告，填平衡表，讲经济学课，但不能搞自己的专业，也不让去中学教书。1933年虽已“刑满”，无人管他，巴赫金觉得，到处都像库斯坦奈一样，也乐得“定居”下来。他的好友不断为他邮寄他所需要的图书资料，使他在1934年至1935年间，写完了《长篇小说的话语》。1936年巴赫金应梅德维杰夫之约，来到萨兰斯克，被邀进师范学院教书。1937年，周围又是到处抓人，9月辞职，随后“溜走”，只得来往于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借宿亲戚家里。由于当局规定，刑事犯人刑满释放不能再迁返莫斯科，所以巴赫金无法报上户口，只得在莫斯科附近的萨维洛沃市落脚。1938年骨髓炎大发，真是雪上加霜，2月截去了一腿。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巴赫金穷极潦倒，已靠亲友接济过活，但仍在读书写作，写成了《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长篇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长篇小说话语的发端》《史诗与长篇小说》等。整个战争期间，巴赫金一直住在萨维洛沃，在一所中学教德语，1940年就完成了关于

^① 可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中译本第7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拉伯雷的创作的学位论文写作。战后巴赫金将它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申请学位。一些评委大为赞赏，一些人极力反对，最后只被授予了副博士学位，但这也大大改善了巴赫金的生活。同时旧友建议巴赫金去萨兰斯克教育学院任教，于是他一直在那里工作到1965年退休。1971年年底，一直和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叶琳娜·阿列克山大洛夫娜病逝，而到1972年7月底，经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的意外“干预”，77岁的巴赫金才算落了莫斯科的户口。

巴赫金的被“发现”是在五十年代后期。当时有的学术讨论会上就有人提到了巴赫金。而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的青年研究人员柯日诺夫，读到了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并在该所档案资料部门查阅到巴赫金的学位论文《拉伯雷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地位》。他感到前者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中是最有分量的著作，而后者的不同凡响的观点，使他大开眼界，深为惊讶。于是多处打听，巴赫金何许人，今在何处？得到的回答是，此人早被流放，或许已客死边地。不过最终得知，巴赫金现在执教于萨兰斯克的摩尔达瓦大学。于是遂有1961年6月的会面。是时，柯日诺夫为了淡化会见老人时产生的沉重的印象，邀请同行鲍恰罗夫和加契夫同行，造访巴赫金。巴赫金其时年届65岁，生活虽已不算清贫，但家里陈设简陋。三人站在巴赫金面前，立时感到他身上的一种在生活苦难面前凜然而立的学人风格。巴赫金知道他遇到了理解自己的知音，不过已处事不惊，交谈一开始就说：“你们要注意到，我可不是文艺学家，我是哲学家。”^①而在15分钟后，天性直爽的加契夫已跪在巴赫

^① 柯日诺夫：《关于巴赫金的个人命运》，《对话·狂欢·时空体》，萨兰斯克，1991年第3期，第110、111页。

金面前，嘴里说着：“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生活可好，在经历了种种考验之后，还是这个样子，您怎么样了？”在这种场合，其他人自然也不能自持。最后他们建议巴赫金尽快修订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争取再版。

会晤使双方各自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就三个年轻人来说，老学者的命运使他们不胜唏嘘，同时又看到了一位卓尔不群的学者，一位在学术研究中另辟蹊径、见解独到、著述丰富的理论家。对巴赫金来说，他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写了大量的论著，由于命运不济，而只好将它们尘封于储藏室。他认为他的“一切都已完了”，如今他已安于现状，在某种程度上已认可这种定局了；可是突然一切重又开始，而在他这个年纪，重新开始可并不那么轻松^①。他觉得，让他修订旧著再版，“这事未必会有什么结果”。不过，巴赫金还是进行了修改工作。经过柯日诺夫的一番斡旋，《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修订后更名《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于1963年再版。可关于拉伯雷的论著的出版呢？巴赫金信心仍是不足，一改再改。柯日诺夫从他手中夺过手稿，多方施计，甚至发动了一场签名运动，才使得《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于1965年正式问世。不管这些著作引起争论和发生什么影响，巴赫金第一次被“发现”了。

巴赫金两书的出版，引起了法国结构主义者的注意。他们发现了苏联的形式学派文论，曾把它们译成法文出版。现在看到巴赫金的著述，以为他的论说可使他们的理论得到更新，可以有力地支持结构主义文论的观点，于是将它们译成法文，介绍过去。

^① 巴赫金给柯日诺夫的信，1961年7月30日，《莫斯科》1992年第11—12期。

巴赫金的著述很快地在西方文论界传播，不想苏联还有这样论述西方文化而见解独到、论说精深的著作。巴赫金有关民间文化解构中世纪专制的官方文化的“狂欢化”理论，使得西方学者大为倾倒，不少派别的学者纷纷前来攀附。这样一来，巴赫金在国外竟名声大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巴赫金的旧作、新作时有发表。1975年，在80岁的巴赫金逝世那年，收集了他不同时期论文的《文学美学问题》出版，但巴赫金本人却未能见到；1978年，由鲍恰罗夫编选的《话语创作美学》出版。同时二十年代的几本用友人名字发表的著作，包括《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相继译成英文，在国外刊行。至此，在苏联围绕巴赫金关于文学理论、符号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阐释时，西方学者不仅在大谈巴赫金的“主体间性”，并且对其文化理论进行着相当深入的研究。这样，巴赫金的研究领域得到了扩大，成了第二次“发现”。

八十年代，巴赫金的著作不断被整理出来，上面提到的二十年代用友人姓名出版的几本著作，一时议论纷纷，不断对它们进行考订。1986年，他的从未面世过的有关“伦理哲学”的著作，被取名为《论行为哲学》发表出来。同年，由鲍恰罗夫与柯日诺夫合编的巴赫金的《文学批评文集》出版。1984年，美国学者克拉克与霍奎斯特合著的《米·巴赫金》出版，此书声称“在西方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圈子当中，他已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认为巴赫金的工作最接近于“哲学人类学”^①。在苏联，对巴赫金的方方面面的认识不断扩大，多从各个方面去探讨，但较多的是从文学理论方面。有的认为巴赫

^① C. 克拉克、M. 霍奎斯特：《米·巴赫金》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10页。

金是东正教的宗教家，有的则认为他是革命的先锋派。九十年代，巴赫金的一些论文笔记、书信不断在刊物上登载出来，同时鲍恰罗夫与柯日诺夫的一些回忆性的文章，披露了许多不为他人所知的事实，澄清了不少问题，对推动巴赫金的研究极有帮助。巴赫金终于从历史的尘封中走了出来，他的哲学思想的各个方面在前苏联不断得到展示，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对于巴赫金来说，他写文学理论著作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写它们，为的是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因为环境不容许他将自己的思想，通过通常的哲学形式加以表达。这就是为什么生前他一再称自己不是文学理论家而是哲学家的原因了。在西方哲学家中间，如海德格尔、萨特、伽达默尔，也常用文艺或文论形式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但那是一种个人嗜好，一种欢快的写作，是哲学中言论转向的产物。而对于巴赫金来说，文学理论多少是种隐蔽的选择，一种无可奈何的形式，但由此却给当代哲学增添了一种独特的体裁，同时又提出不少新鲜命题，大大地丰富了文学理论。

1988年，笔者曾在莫斯科等地进行学术访问。在列宁格勒，苏联文艺理论家伊耶祖依托夫和我谈起巴赫金时讲了一个小故事：一位列宁格勒的研究生与一位院士谈到巴赫金的学术地位时，这位院士做了一个比喻：你现在是研究生，我是院士；要是我是研究生，那巴赫金就是院士。这可能是个民间传说，但对巴赫金的学术地位，描写得相当真切。实际上，巴赫金不但不是院士，甚至连教授、博士的头衔都没有。有人曾劝巴赫金去申请教授职称，巴赫金对此十分淡漠，至死不过是位语文学副博士而已。但是巴赫金作为一位二十世纪重要的思想家，昂然而立。这是巴赫金的第三次被“发现”。

一些论著的著作权问题

大约七十年代开始，不少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几本巴赫金的文艺理论著作的真正的作者问题，进行了持久的讨论。这些著作就是原来署名沃洛希诺夫、出版于1927年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和出版于1928年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署名梅德维杰夫、出版于1928年的《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还有一些论文，如署名梅德维杰夫的《学术上的萨里耶利主义》、书评《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论》、《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伊奥兰特·奈菲尔德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缺乏社会学的社会学观点》等；有署名沃洛希诺夫的《在社会性的彼岸》、《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等；还有署名卡纳耶夫的《现代活力论》等。

七十年代中期以前，苏联文艺界早就得知，巴赫金就是上述论著的作者。例如，柯日诺夫在六十年代初，就从语言学家维诺格拉多夫、文艺学家别尔科夫斯基、什克洛夫斯基等人那里得知，《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出自巴赫金之手。苏联著名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在二十年代末读到沃洛希诺夫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过后曾对作者说：“想不到在你身上还藏着一位语言学家”，意为沃洛希诺夫过去发表的论著并不如何高明，此书却写得如此精深，这一评语实际为圈中人所知。但如何证实却遇到了一些困难。照理说，巴赫金在世时此事不难解决。但从六十年代开始，巴赫金就回避此事。例如，1960年11月26日在给柯日诺夫回信时说：“《形式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等书我很熟悉。B.H. 沃洛希诺夫和П.Н. 梅德维杰夫都是我的故友；在撰写这些书的期间我们在

创作上有过密切的接触。不仅如此，语言和言语作品的共同的观点，奠定了这些书以及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著的基础。在这方面，B.B. 维诺格拉多夫完全准确。应该指出具有共同的观点和创作上的接触，并不贬低其中每一部书的独立性和才华。”^① 1973年初，当巴赫金接受维克多·杜瓦金的录音采访时，还在说：“我有个亲密的朋友，是瓦连京·沃洛希诺夫。他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现在这本书可说有人要归于我的名下。”^② 这一谈话内容直到九十年代才公布出来。这就是说，巴赫金在七十年代初对几本书的著作权是有保留的，而且是不大愿意谈论的。

有意思的是美国的白银出版社对巴赫金的著作权，作了追踪式的辨析。从七十年代开始，苏联文艺界人士在公开的文章、讲话中，不断提到巴赫金和上述著作的关系。有时含糊其辞，例如1970年莫斯科大学为巴赫金75岁生日举办的纪念会上，O. 列夫济娜在总结的短文中说：“在二十年代末，M. 巴赫金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反映在当时的一系列出版物之中。”但在短文的注释中，所指的“一系列出版物”就是上面提及的梅德维杰夫和沃洛希诺夫的3本著作。这一说法，看来不无根据，不是任意说说的，它至少说明巴赫金领导过这些著作的设计，或参与了这些著作的写作，而且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有时则说得相当明确，如同在这个会上，与晚年的巴赫金甚为接近的B.B. 伊万诺夫，在报告中提到，这些署了梅德维杰夫与沃洛希诺夫姓名的著作，实际上系巴赫金所写，梅德维杰夫与沃洛希诺夫作为巴

① 巴赫金给柯日诺夫的信，1991年1月10日，《莫斯科》1992年第11—12期。

② 《巴赫金访谈录》，见杂志《人》，1993年第4期—1995年第1期。

赫金的学生，只是在这些著作的个别章节与文字上作了一些改动。1977年、1979年在鲍恰罗夫为巴赫金的文章、文集所写的前言、注释中，实际上持有相同的观点。一位美国学者在美国版的《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前言里，曾引用柯日诺夫的通告中说的话，说巴赫金临死前签有文件，宣布自己是上述著作的作者，要求今后重版上述著作时，署上他的姓名。这样，白银出版社在1982年再版的俄文本《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的《出版说明》中，根据上述基本事实宣称：“出版社不照顾任何人的威望或优先权，认为现在有足够数量的事实证明《弗洛伊德主义》《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都是巴赫金一个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梅德维杰夫和沃洛希诺夫可能参加了编辑工作。”^①其后，苏联理论界似乎接受了这一事实。

九十年代，当苏联学者再谈巴赫金与这些著作的关系时，实际上都已肯定巴赫金就是这些著作的作者了。特别是鲍恰罗夫发表在1993年《新文学评论》第2期上的长篇论文《关于一次谈话及其相关问题》，相当程度上明确地说明了巴赫金的一些论著的著作权问题。鲍恰罗夫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一直与巴赫金保持了十分亲密的关系，与巴赫金交谈甚多，并在每次谈话后当天都做有记录，所以他提供的材料极有分量，也极具权威性。他谈到，巴赫金很不愿意提及那些有著作权争议的著作。1970年夏，在巴赫金家里，谈及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时，巴赫金夫人当着鲍恰罗夫的面面对巴赫金说：“米申卡（巴赫金的爱称），你记得吗？在芬兰别墅里，你是如何给瓦连京·尼古

^① 白银出版社的《出版说明》，见《巴赫金全集》中译本第2卷题注，《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一文的附录。

拉伊维奇（沃洛希诺夫）口授的。”巴赫金自言自语地说：“你看，我想我能为自己朋友做些事，而这对于我是不值一提的，我想我会写出自己的书，不附那些不愉快的补充……可我料不到一切都这么定局了。而后，这一切就有了意义，著作权，名字？半个世纪以来，在这并不美满的土地上和并不自由的天底下所创造的一切，在这种那种程度上都是带有缺陷的。”但在1974年11月21日的一次谈话中，鲍恰罗夫写道，巴赫金“承认，三本书（《弗洛伊德主义》《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和1926年的文章《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都是他写的，甚至是‘从头到尾’，但这是为朋友们写的，并给了他们著作权。关于沃洛希诺夫的其他文章讲得就不那么肯定。但回忆起1930年那篇相当尖锐和机智地批评B.B. 维诺格拉多夫的语言学诗学的文章《论诗学与语言学的界限》时，就带着微笑，好像十分满意似的”。至于为什么要使用友人姓名，巴赫金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需要出书，而我在准备写自己的书”，“在出版物上面使用自己名字，我是想还不是时候”。至于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书，“决定开始使用了，可我没有料到，这个开始就成了结束”^①。七十年代初，B.B. 伊万诺夫一次问及巴赫金何以用他人姓名出版著作，巴赫金回答说：“您难道以为，我那时可能把自己的名字与称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放到一起吗？”^②显然，在巴赫金的语调里，他已肯定这些著作为他所写，但不能署上真名。确实，在二十年代，名不见经传的巴赫金，一个未参与革命作家组织的人，是很难挤入出版界的，出版方面的种种限

^① 鲍恰罗夫：《关于一次谈话及其相关问题》，俄《新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第73、74页。

^② B.B. 伊万诺夫：《蓝色的野兽》，俄《星》1995年第3期，第117页。

制，在二十年代下半期尤甚。同时，柯日诺夫在与巴赫金多次谈话中也谈及这些论著的真正的作者问题，巴赫金最后承认是他写的，但为朋友们而写，要是以自己名义写，就不会是这样了。这是一个方面的证据。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如维诺格拉多夫、什克洛夫斯基都不怀疑巴赫金就是上面提及的多部著作的作者。而更有说服力的，像沃洛希诺夫的遗孀就在1975年4月致函鲍恰罗夫，涉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等书时说：“这些书是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写的。”关于其他著作的真正的作者问题，也有新说。如《现代活力论》一文的署名作者、巴赫金的朋友、年事已高的卡纳耶夫，就于1975年11月3日写信给鲍恰罗夫，说到《现代活力论》时讲：“这篇文章完全是巴赫金写的，我只是为他收集了资料，协助在杂志上发表，因为我和编辑部有来往。”之后，卡纳耶夫又寄了文章复制品，说明那时为什么如此做：在那些年代，巴赫金需要钱用，为了获得一些收入，写了这篇文章。卡纳耶夫口头上还说到巴赫金当时对生物学问题很感兴趣，听过生物学家乌赫托姆斯基关于生物学中的时空体问题的讲座等^①。后来，巴赫金把“时空体”引入了自己的小说诗学研究之中。

九十年代上半期，俄国迷宫出版社出版了《面具下的巴赫金》丛书，收入五种著作。第一、二、三种即前面提及的三本著作，署有沃洛希诺夫、梅德维杰夫的姓名，第四种系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再版。第五种为巴赫金的论文集《真假面目》，其中收有沃洛希诺夫、梅德维杰夫与卡纳耶夫等人的

^① 鲍恰罗夫：《关于一次谈话及其相关问题》，俄《新文学评论》1993年第2期，第74页。

多篇论文。该文集冠有 B.H. 马赫林的前言《时间抛开了面具》。

1996年，俄国终于揭开了出版巴赫金文集（七卷本）的序幕。是年，莫斯科的俄语辞书出版社首先推出了《巴赫金文集》的第5卷。该卷收入了巴赫金写于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的各种论著，其中相当部分已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发表在杂志上，有十多篇是首次问世。在《编者的话》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俄文版的《巴赫金文集》对过去署了他人姓名的著作的处理方式，即把这类著述都归入了第7卷，取名为“巴赫金小组著作”。这样，既明确了这些著作确为巴赫金所作，又说明了它们的署名情况，保留了它们的历史原貌。但是需要重复巴赫金说过的话，即如果用他自己的名义来写，那么这些书将不会写成这个样子的。

中文版的《巴赫金全集》（七卷）本收进的论著，大体按其作品的写作、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原署有他人姓名的巴赫金著作，除《弗洛伊德主义》一书放在第1卷外，其余都收进了第2卷，取名为《周边集》，同时已将其早期的俄国文学史讲座笔记和外国文学史讲座笔记，编入了中文版第7卷。

从伦理哲学到哲学人类学——交往、对话哲学

巴赫金是不断地被“发现”的，这与他的曲折的生活道路有关。先是文学理论家、语言学家、符号学家、美学家，继而是思想家、伦理学家、哲学家、历史文化学家、人类学家等。这些头衔加之于巴赫金身上，大致是不错的。但是必须说明，巴赫金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与《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是两部完整的著作外，其他三书如《弗